

【中】何干强 (Ganqiang He)

个人简况

何干强，男，1946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市，中共党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江苏省第三届“全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1981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曾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参加援藏教学，赴西藏大学讲授《资本论》；作为国家教委选派的高访学者赴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进修访问。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南京市铁路北街路128号南京财经大学15号信箱

邮编：210003

电话：025-83494986

E-mail: heganqiang6229@sina.com

主要著作

著有《〈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等著作，并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其他课题10多项；发表论文、译文和调研报告150余篇。其中两部国家级重点图书，一部普通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获省政府级个人科研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省政府级集体一等奖1项、集体三等奖2项；部级三等奖1项；获省级精品教材、优秀课程建设二类奖和教学成果二等奖各1项。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实践创新

【中】何干强

内容提要：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赋予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定内涵。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应当弄清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而且要弄清公有资本的流通与私人资本的流通的根本区别。宏观调控的实践创新要求从解决生产领域的失衡入手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问题，调整产业结构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通过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扩大消费需求，把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作为扩大就业的关键措施，坚持国民经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

关键词：宏观调控 理论创新 公有制 独立自主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中国国民经济运行面临困难，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克服；为此，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定内涵，因而绝不能用凯恩斯主义理解中国的宏观调控。须知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具有共同的弊病，就是把资本主义当成永恒合理的经济形态，不能区分一般流通（指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因而它们不可能指导科学的宏观调控。

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面对市场经济，既要看到一般流通和资本流通存在共性、联系（都包括商品和货币交换关系），又要认识两者在流通的目的（前者是为个人消费，后者视为追求剩余价值）、内容（前者是使用价值交换，后者是独立价值的自行增殖）、持续性（前者是满足个人消费为限，后者为追求剩余价值永无止境）和承担者（前者是小生产者或消费者，后者是资本家）方面存在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应当弄清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而且要弄清公有资本流通与私人资本流通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公有资本流通过程的生产环节中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显然，公有资本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动，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存在根本区别。

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在实践中实现以下创新。

一、从解决生产领域的失衡入手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问题

（一）必须区分金融危机和特种货币危机。

不能只从货币金融领域来看待金融危机。马克思指出，“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

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a(英语原著：The monetary crisis, defined in the text as a particular phase of every gener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risis, must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pecial sort of crisis, also called a monetary crisis which may appear independently of the rest, and only affects industry and commerce by its backwash。The pivot of the these crises is to be found in money capital, and their immediate sphere of impact is therefore banking, the stock exchange and finance。)^b现代的金融危机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讲的前一种货币危机，也就是与生产、商业危机联系在一起、在货币流通领域表现为信贷危机的经济危机，而不是那种单独发生在货币流通领域的特种货币危机。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尚未真正形成，所以马克思只是强调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货币危机，还没有直接地把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称之为今天我们所说的金融危机。金融资本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出现的，列宁指出，“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c。可见，金融资本不等于单纯的货币资本。后者是存在于货币形态上的资本，如存在于银行、交易所、财政领域的货币资本，并不包括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和商业领域的商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则是银行资本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包括今天在服务领域的资本的融合。今天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独发生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流通领域的危机，而是与工商业危机结合在一起的、在金融信贷环节上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金融货币领域的借贷关系的断裂，不过是生产领域危机在货币流通领域的表现形态。

(二) 金融货币领域的问题是现象，社会再生产中的问题是本质。

当代治理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信贷失衡问题，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货币和货币资本流通的领域，而必须充分重视生产与流通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货币流通一旦发生渠道堵塞的故障，必须着眼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生产环节。

这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指导宏观调控。这个规律指的是，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生产领域各部门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是通过相互交换商品，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replacement both in value and in material）的；如果这种交换正常，商品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的手中。^d这个规律显示出，如果全社会商品流通正常进行，那么一般的企业在资本循环中，投入流通的货币（货币形式的

a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8页，页下注（99）。

b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76, reprint in Penguin Classics 1990, P,236, see(50).

c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页。

d 关于货币流回规律，《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V. 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一节做了专门阐述，其他地方也多处提到，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6页，459页，508页，512页，534页。

资本价值)就能够回到企业;假如企业的货币来自银行贷款,那末货币就会流回银行。在现代银行信用制度下,企业的货币投入与中央银行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比较正常,中央银行投放的货币就能比较及时地回流。因此,货币流回规律其实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表现形态。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否正常与货币能否流回,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为此,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必须首先重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衡造成的商品流通中断的问题。

如果把金融危机当成“可以单独产生”的特种货币危机,就会以为,向货币和货币资本流通领域注入资金“救市”就可以阻止金融危机。显然,这是只停留在经济的表层现象上想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问题应当从解决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失衡入手。

二、调整产业结构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

(一) 调整产业结构要着眼于生产关系。

产业结构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力总是一定生产关系关系中的生产力。虽然对生产力本身做理论分析可以暂时舍象生产关系,但是,如果解决现实经济中的生产力问题,就必须结合生产关系来进行。

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不是被动的,它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联系在一起。一旦建立起与生产力基本适应的生产关系,它的巩固和完善,就能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而它一旦遭到破坏,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破坏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失衡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通过私有制加大市场分工制度的自发性,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而引发的。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平衡取决于它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结构相适应;有购买力的需求及其结构,则是由分配关系及其结构决定的。而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基本原理,要调节好适应市场需求及其结构的分配关系,最根本的则是调节好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结构。

(二) 要使产业结构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结构相适应,就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这也就是说,必须形成一个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产业结构,来发展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如果产业结构偏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所有制关系和结构,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失衡,进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盲目发展小汽车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就是一例。这等于把与它相联系的一系列产业所耗费资源和劳动力,都用于为能够买得起小汽车的阶级和阶层服务了。须知目前中国大多数劳动者还买不起小汽车,这决定了小汽车产业的发展一旦超出其狭小的有购买力需求的限度,就会因供过于求而影响一大批相关制造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变成金融问题;这里还不谈小汽车过多在交

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带来的后果。

——房地产业又是一例。由于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房，产生出由商品房流通不畅，从而引起货币流通不畅的问题；再加上房地产的炒作引起泡沫，这就更加变成金融问题。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产业结构出现了不利于大多数人的因素，就会引发金融问题。一般地说，引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显然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而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会越大。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导向可以利用好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长处，减少这种自发性；但是，如果公有制基础被削弱，计划导向就难以实现了。

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进行，才是科学的。

三、通过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扩大消费需求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与私有制，而不是消费需求不足。

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是肤浅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a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消费只能是进行支付的消费。产能过剩、商品卖不出去而形成危机，这与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完全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原因，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二）中国目前出现的消费不足，原因在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

据资料，中国消费率从1997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8.8%，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4%下降到39.74%。而同期资本收入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上升，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到20.57%。^b这种状况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下降成正相关。有统计学专家测算，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从分别为73%与27%，演变到48%与52%。^c这种正相关，验证了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因此，要解决消费需求下降的问题，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这是改善民生的治本之策。

（三）私有化加公共财政再分配之路走不通。

a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6页。

b 《4万亿投资重在做大民生“蛋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首页>政务信息>财经视点>中国财经报](#)，2009-03-23。

c 李成瑞：《大变化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极其复杂性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第1页。

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形成的格局已成定局，不宜改变，主张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这种“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然而，那些国家行过一时，目前已经行不通了。它们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时，也是因为它们作为“中心国家”掌握先进生产率，可以通过“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能从中分出一部分给本国老百姓搞公共福利，从而缓和阶级矛盾。但是，中国没有这种条件。

因此，“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只有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扩大消费需求。

四、把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作为扩大就业的关键措施

（一）发展私有制的经济增长不能持续扩大就业。

一般认为，经济年增长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才能保就业，初看起来这有些道理，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却可以发现，这种看法并不科学。只要引入了生产环节中所有制性质这个因素，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追加财政性投资主要用于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那么，这将不可能保证就业的稳步增长。因为这无法改变私人资本积累规律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须知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以失业率的存在为前提的。而通过财政手段追加投资，如果不是着眼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只是着眼于暂时增加总需求，那么，本来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或者说产能过剩就会被暂时掩盖起来；矛盾积累总会爆发的。如果财政投资是靠寅吃卯粮，靠赤字财政，后果将是通货膨胀，情况将更加糟糕。

（二）只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扩大就业。

要真正地扩大就业，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也就是通过计划指导，服从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振兴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把收入差距限制在按劳分配范围内的、能够自觉服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新型公有制经济。如果能够在调整结构的同时，利用目前大批私营企业目前经营上的困难，实现新的由私向公的“转制”，增加就业，在实践上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经济真正占主体地位，那么，即使暂时经济的年增长率没有达到8%，但是，由于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社会就会稳定，科学发展就有希望。我们在公有制前面加了“新型”两字，这是因为有人说我们要回到旧体制。他们把公有制与旧体制看成一回事，实际上是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我们则认为，现在要振兴的是与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结合的公有制经济。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已经体现在改革后富有朝气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问题是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就业，最终消灭失业。

五、坚持国民经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

（一）坚持从国力出发搞好宏观调控。

搞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从国力出发。从对外经济关系角度来看宏观调控，首先要区分国力与外力。作为中国国力的民族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和合法经营的私人资本，不包括外国资本。本来，合理利用外资是为了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目前不少地方干部却把外资当成中国的国力，出现了盲目引进外资的倾向；加上把改革开放与建立独立自主国民经济体系对立起来，盲目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大了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加大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顺差，这就加大了超过合理限度的外汇储备，从而加大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我国经济的制约。这种制约性越大，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就越大。所以，宏观调控必须控制利用外资的总量。

（二）维护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就不能允许国际资本自由出入中国。

货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区分国际货币流通和国际资本流通。前者与外汇经常项目的兑换相联系，涉及的主要是国际商品流通引起的国别货币的兑换；而后者则与外汇资本项目的兑换相联系，不仅涉及国别货币形式的兑换，而且涉及国别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涉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体的相互利益关系，也就是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体掌握的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资本的流通尤其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在国际间发生空间的移动），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密切相关。它们与国际货币流通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同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两者的本质区别。

须知，即使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八条款尽管明确规定了外汇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也并没有明确规定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当说，这反映出，世界上的国家对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经济主权，都是抱维护的慎重态度的。因此，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不是判断金融业是否对外开放的标志。毫无疑义，我国的金融业必须对外开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分不同国家之间民族经济利益的界限。只要有损于本国民族经济利益，就不能随意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三）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等才是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基本条件。

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放开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一个重要论据是，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可以使商品价值降低，这对广大消费者有利。这是似是而非的。其实，市场竞争并不是只有商品流通领域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存在资本流通领域的竞争，市场竞争的结果，影响的不仅是商品流通领域的卖者和买者，而且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国际市场竞争是以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在国家之间生产力水平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国际资本自由进入生产力低的国家，这固然在一定阶段某种程度上会扩大该国就业，但是，因为其有机构成高，劳动生

产率高，吸纳劳动者人数会明显少于有机构成低的民族企业。由于生产力低的国家经济实力受到发达国家资本的排挤而严重削弱，即使外国企业的产品物价较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仍然会因为民族企业打工工资低和因民族企业破产而失业等因素，缺乏购买力，这就谈不上得到什么益处。金融自由化理论只分析一般流通中的竞争，不分析资本流通中的竞争，这显然是片面的。

根据马克思揭示的国际市场竞争以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国家之间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对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国际自由竞争，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开放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促进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才会使国家的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中获取长远的与竞争国对等的比较利益。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解决中国国内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是，下定决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出发，调整产业结构，构建既开放又独立自主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当然，针对急于解决的金融问题，也不能忽视治标之策，也就是用财政手段追加经济结构中的短线投资、解决银行呆账，用政治手段制止金融投机、腐败等等。

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内因是主要的。中国资本项目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没有开放，把我国金融出现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外因是缺乏根据的。不过，没有必要担心，如果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延续，中国一定会跟着倒霉。我们坚信，中国只要坚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动摇，国际金融危机再严重，民族经济也能够做到“我自巍然不动”